

中国早期现代化向制度、文化层的推进 和孙中山的发展蓝图

张 琢

本文阐述了自甲午战前为发展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早期维新思潮的酝酿，导致戊戌维新的政治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中经戊戌政变的反动及其后清廷无可奈何推行的“新政”；再进向辛亥革命，达到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高潮；以后却是封建军阀的复辟，使这一次中国现代化向政治层和思想文化层推进的尝试受挫。这一社会变革过程的理论总结和中国未来发展蓝图的设计，则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方略》强调“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

作者：张琢，男，194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我在《中国现代化的分期与发轫》^①中，探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在器物层面上的发轫。本文继续随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来探讨其向制度层、思想文化层的推进和孙中山此时对中国发展理论和发展计划的贡献。

一、维新思潮的酝酿

还在甲午战败之前，面对国内政治的腐败、外国资本主义全面入侵的刺激和刺激面的日益深广、洋务运动的发展及其弊病的显露、民间资本主义在1870年代的出现及所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挤压，人们进行着越来越深刻的反思。维新先驱多曾留学和出使外国，比较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同外国资本主义、洋务活动、封建政府当局及民间资本打过交道或参与其间的活动。由于他们既有程度不同的西学知识，又对几方面的实际内情和相互关系有较深切的了解，省悟到中国必须改革才能发展资本主义，才能适应时局的变化，也才能对付外来的挑战。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

留学生马建忠在1877年从欧洲上书给李鸿章说，他初到欧洲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扩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②但是，马建忠经实地考察西方议院后又觉其虚伪，因而不赞成在中国实行这种制度。

^① 见《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6期。

^②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

第二台
七寻机

王韬，青年时代曾在上海教会书馆中工作，后去香港从事翻译，又赴英、德、俄考察，回国后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他介绍说，西方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类型的国家。他最推崇的是君民共主，可使“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①

郑观应，先做买办，又兼营工商，痛感列强以“通商”之名“渐夺中国之权利，并侵中国之地”（《易言·论传教》），因而应洋务派之聘入招商局，以“夺洋人之所恃，收中国之利权”（《易言·论船政》），后来又参加反法战争，被太古洋行执住拘于港府，归来遂作《盛世危言》。此时，资本主义先发国家已渐次向垄断过渡，进入了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掠夺殖民地的竞争更为疯狂。《盛世危言》正好在甲午战争前一年出版，郑观应在该书中敏锐而深刻地揭露了日、俄、英、法侵华的严重态势，预警日本将先占朝鲜、进迫中国，野心已毕露：“近来日本讲究水师，频添战舰，多置军械，及遣人分往各口……时入内地，暗察形势，绘图贴说，其志叵测”（《盛世危言·海防下》）。而且，郑观应不是孤立地讲“兵战”的严峻形势，还进一步强调了“商战”（他的商战的具体内容包括工业）的重要性，主张“借商以立国，借兵以卫商”（《盛世危言·商务》）。他尤其突出地强调设立议院才是“富强之本”：“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用心，教养得法。”他说：“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认为洋务派是“遗其体而求其用”（《盛世危言·序》）。在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上，《盛世危言》虽然主张“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但是实际上是意在移花接木，为引进西学开路，与后来的反改革派以此来抵制政治制度的改革，用意是不同的。

当时，其他维新改良的先驱者互相呼应，宣传着类似的观点，从而形成了一种维新改良思潮，归纳起来即：经济上，主张以工商为本，保护和发展民族资本；文化教育上，主张废八股，办学校，开民智，出人材；政治上，主张设议院，采众议，通上下，用君主立宪、君民共主代替君主专制。这些思想脱胎于魏源、冯桂芬和洋务派，而又增添了新的内容，最有代表性的主张是在政治上以君主立宪的议会制政体代替传统的君主专制政体，并提出了清仕途、裁冗员、废捐官制、整顿监狱、改革律例等许多具体建议，体现出这些人物及其思想具有了资产阶级早期改良主义的性质。所以，这些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者又被称作改良主义的先驱。

二、戊戌维新：政治、文化现代化的揭幕

经过四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和一个多世纪的工业革命，到19世纪9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非洲和拉丁美洲已作为殖民地被瓜分完毕，亚洲只有庞大的中国和朝鲜、土耳其、波斯、泰国等中等国家还维持着半独立状态。所以，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尤其东方后来崛起的日本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对象。1874年清政府在日本侵略台湾事件中“委曲求全”、“迁就了事”，1885年中法之战不败之败所表现的怯懦、腐败、无能，更进一步助长了列强侵略的野心。日本在明治初年就制定了征服大陆的政策：“为了征服中国，

^① 王韬：《扶园文集外编》，第23页。

我们必先征服满蒙；为了征服世界，我们必先征服中国。”^① 经过长期准备和周密策划，终于在1894年将侵朝战争延伸、扩大为直接的侵华战争。面对日本破釜沉舟的进攻，李鸿章始终“志存和局”，竭力避战。结果战争历经8个月，便以北洋水师覆没、陆师溃败而签订了鸦片战争以来最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人得以控制了朝鲜，获得了日后继续入侵中国的桥头堡。战争赔款加上后来“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共达2.3亿两（白银，下同），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3倍，为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投入现代产业（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总和（1.2亿元，合0.8亿两）的近3倍。日本的资本主义及其战争机器得到了巨大的外来资金，迅速发展，中国则背上了沉重的外债。甲午战争后的3年里，清政府所借外债达3亿多两，而且利息重、折扣大，真是“括地难偿”，从而极大地削弱了现代化的投资能力，严重地滞缓了中国的发展。条约规定开放众多内河内陆地口岸、日人可自由设厂、豁免中国内地各税，其他列强亦据前约利益均沾，使外国在华投资迅速增长，而中国财政却大受损失。同时又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分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此之后虽有了初步发展，但是又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的双重挤压，致使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台湾等岛的割让，更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作了恶劣的示范。俄、德、英、法、美等国，纷纷效尤向清政府伸手，在中国划界、租地，争夺势力范围，到1897—1898年愈演愈烈，更加深了中国亡国的危机。

殖民地型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在矛盾中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分解，朝廷的腐败、昏庸、无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加深，西学的传播和改良思想的酝酿——这些因素的叠加、互动和综合作用导致了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

在具体的组织和思想准备上，维新领袖**康有为**于1891年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培养维新变法人才，学生到甲午时已由初创时的20多人增加到百余人，连同以后康有为在桂林讲学的学生以及京、沪来拜门的学生，共达千人之多，成为康有为以后领导的维新派的基本队伍。万木草堂实际上是起到了维新运动的干部准备学校的作用，其中梁启超、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等人都成了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老、崇尚传统的国家，借用历史的亡灵来推动改革是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战术，可以使革新减少阻力，何况，在中国借重孔子的权威——“挟天子以自重”——本来就是故伎。康有为在梁启超等人协助下在草堂精心炮制的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以“我注六经”的形式行“六经注我”之实，来达到托古改制的目的，冲击了顽固势力死守的祖宗陈法，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为维新变法做了“广联人材、开创新风”的准备。

中国科举取仕的文官制度发展到封建后期，其八股化的确造就了一些书呆子，但也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担当国家重任的使命感，尤其明清以来随着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加深，知识分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上升及晚清经世之学的提倡，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儒腐气。1895年春，参加会试的举人云集京都，《马关条约》的恶讯传来，引起以天下为己任的举人们的震惊。康有为、梁启超于是联络湖、广举人联名上书拒约，各省举人纷纷响应形成了沸腾的舆论。康有为趁机连夜起草了14000字的上皇帝书，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其中前三项为“权宜应敌”之策，第四项“变法成天下之治”则是“立国自强”的根本。上书分析了世界大势，指出必须以“开创之势”取代“守成之势”，因而要更新百

^① 龚古今等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第94页。

度，不要墨守旧章，主张以府县为单位选举有才学的“议郎”供皇帝咨询，“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皆由议郎讨论，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方能生效、实行。各省举人有1300多人在这封万言书上签了名。由于自汉朝以来就兴用公车接送征举的士人，后来人们就以“公车”作为进京应考的举人的代称，这份上皇帝书也因此以“公车上书”载入了中国史册，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现代性的先进阶层登上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舞台。这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皇帝书。接着，除继续上书皇帝（共上书7次）外，他又在北京出版《中外记闻》，刊载“格致有用之书”，考“万国强弱之原”，鼓吹维新，创“强学会”，广联人材，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睽，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强学会序》）除维新志士外，一时间帝党和洋务派官僚也以捐款入会为荣，英、美驻华公使及传教士头面人物亦表示支持维新派的活动。康有为又在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分会，并于1896年1月出版了《强学报》。同年，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由梁启超任总编辑，以“变法图存”为宗旨，风靡海内外。1897年，湖南设立时务学堂，创办《湘报》和《湘学新报》，同时成立南学会，宣传新学，“联群通力，发奋自强”。在天津，严复、夏曾佑等人创办《国闻报》，评述《天演论》，宣传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说。据统计，到1897年底，全国出现了讲变法自强的政治性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报馆合计达300多个，^①可见维新运动在组织上和宣传上发展之迅猛。

1897年冬，德国又强占了山东胶州湾，俄、法、英皆张牙舞爪，“瓜分豆剖”，步步进逼，康有为赴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疾呼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以变法为国家大政，立即集天下贤才商定变法方案。光绪皇帝决心采纳变法主张。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呈送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和《日本明治变政考》等书，又发起组织了具有政党雏形的“保国会”，会章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11日下“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维新期间，光绪帝任用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一派新人物，颁发了新政诏书、谕令110多道，其主要内容为：设立制度局，改革旧机构，撤汰闲散、重叠的衙门和冗员，提倡廉政和上书建议，保护和奖勉工商业，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和商学、商报、商会各类组织；改革财政，严格预、决算制度，并按月公布情况，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设各级学堂并派人出国留学，提倡西学，设译书局，创办报刊，奖励著作和发明，准许组织学会；设厂造军火，练新军，裁汰旧军。

这些新政处处触犯了上下腐朽的官僚和社会势力，上自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权贵，下至八股士子、土豪劣绅、和尚道士，对新政深恶痛绝，“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骂维新派“离经叛道、惑世诬民”，“目无君上”，“聚众谋反”，“僭越妄为，非杀不可”。

如果说光绪帝接受的维新思想和主张比慈禧太后的顽固观念要高千百倍的话，在用权的老谋深算上，光绪皇帝却仅是一个稚气的小儿。就在光绪皇帝一道道发出变法的诏书的时候，慈禧太后已釜底抽薪，胁迫光绪帝撤了支持变法的大学士翁同龢的职，用她的宠臣荣禄控制了京畿，太后本人还直接控制了高官的任免权，把军事、人事安排好之后，便发动了政变，史称“戊戌政变”，而光绪帝和康有为、谭嗣同们还把希望寄托在与顽固派里应外合的袁世凯身上。结果，光绪帝被软禁，维新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分别在英国人和日本人保护下

^① 参见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7页。

逃往国外，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杨锐、林旭英勇就义。

戊戌维新的失败，使中国失去了依靠既有的统治权威进行日本和俄国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从而走上现代化自强之路的机会。这是中国继明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夭折于腐败政治的摧残和战乱、清“乾隆盛世”的妄自尊大与闭关及“鸦片战争”的失败被迫开放后仍不振作，又一次错过了立起直追世界发展潮流的机会。同时，也使清王朝失去了最后一次由被动转向主动的中兴机会。此后，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再一次教训之后，即使它再想来一次“维新”，也得不到有识之士的支持了——人们通过戊戌政变已对它“断念”，也就是说，它已**丧失了主持现代化发展的权威了**。它只有一个下场，即在社会现代化的前进运动中被作为历史的垃圾淘汰掉。所以，尽管顽固派能在戊戌政变中得逞一时，但是没过多久便被摧枯拉朽般推翻了，应验了康有为在戊戌奏折中所说的“方今不变固害，小变仍害，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①的预言。

就当时来说，变法失败得如此之惨，还是由其主客观条件决定的。就客观条件看，一是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和二百余年的清王朝统治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基础仍然是厚重的，虽然自鸦片战争以来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中已有新的现代性因素在生长，并具有不可抗拒的生命力，但在当时比起旧势力还弱得多。二是清王朝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贵族政权，并处于没落的后期，朝廷中又形成了以慈禧为首的根底很深的握有实权的后党和以光绪帝为首的稚弱的帝党的二元结构，而维新派借重的不过是那样一个皇帝的虚名，这种民族的和朝廷权力的双重的二元结构，就使得清王朝难以像民族和政治结构都比较单一的日本那样顺畅地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

就主观条件看，当时中国现代产业还很薄弱，政治上、文化上的现代成分亦然。维新派主要是一批尚未成熟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政治上幼稚，组织上准备欠缺，军事上更是既无实力又完全外行，这一次不过是他们登上历史舞台初试锋芒，面对那样根底深厚、凶险的对手，是不能不失败的。同时，他们救亡图强变法心切，103天就下了诏书、谕令110多道，却没有建立起能贯彻下去的执行机制和操作手段。结果，新政措施下达下去，下面的守旧官僚“概不奉行，亦不复奏，电旨严催，置之不复”^②。即使没有戊戌政变，也难以执行，发生实效。中国现代化既有多次坐失良机的历史遗憾，也有屡次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教训。变法伊始，康有为就断言“变法三年便可自立”，就是这种急于求成欲速不达反遭失败的第一个最明显的历史教训。过去许多论者常把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归过于维新派主张不彻底，其实是脱离历史实际的皮相之见。

“百日维新”暂时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它提出的任务却反映了时代的要求，这些要求正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各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新因素发展积累效应的集中体现。许多思想和主张自魏源以来已陆续有人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过，不过，维新派把此前的先驱者的思想和主张更加系统化，并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中，最突出的是**政治上**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和反复强调“兴民权”、“开议院”的重要性。严复大倡自由、民权，痛斥“侵入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论世变之亟》），**“秦汉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耳”**。论证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王侯将相者当为“通

^① 《杰士书札集》卷二（未经删改的《戊戌奏稿》原稿），且不，现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② 苏继祖：《清廷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88页

国之公仆隶也”（《辟韩》）。康有为指出，“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酷之故”（《上清帝第七书》）。梁启超斥责君主专制“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以一人而夺众人之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康有为等人在戊戌期间所上的奏折中，把设制度局放在头号位置上。**政治制度的变革是维新变法的核心。维新变法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意义也就是把政治制度的变革推向了前台，是中国现代化推进到制度层的标志。**

在经济方面，维新派都很重视工业的发展。康有为把机器大工业看作富国强兵的首要基础，还进而论证了大工业对于克服愚昧守旧思想、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改善社会风气的作用，可以说他已经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工业化将引起的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及其文化的变革的连锁反应。他批判了“重本抑末”和“以农立国”的传统，主张“定为工国”，并认为，除货币和邮政外，其他均可“纵民为之”，由私人经营。严复以他翻译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据，宣扬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清廷对民族资本的压迫，反对官僚垄断，要求给民间经营新式工商业以充分的自由。

在社会改革方面，由于当时最紧迫的是严峻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维新时期的社会批判，主要还是为政治改革开路，因此集中在对作为君主专制的社会精神支柱的纲常名教的批判，其中以谭嗣同的《仁学》（写于1896—1897年，刊于1899年）最为激烈，他揭露“三纲之摄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发出了“冲决一切网罗”的呐喊。维新派的社会理想则集中于康有为的《大同书》中，他杂糅中国传统的公羊三世说，礼运大同说，中世纪从南亚输入的佛教慈悲、平等，近世从西方传入的耶教博爱、平等、自由的教义和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及其他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构思出了一个无国界、无等级、无家庭、无私产的大同世界。这些思想若在当时公布出来，自是激进得惊世骇俗。但他当时却并未拿出来，还藏在腹中，到民国时期才出版问世，影响就不大了。

在文化教育方面，中国早在6世纪末即已开创了具有竞争性的科举考试制度，有利于人才选拔。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为适应社会管理和各行业的人才需求，西欧德、法、英各国及日本自18世纪末以来，先后引进中国的考试制度，并建立了相应配套的学校体系。各种职业资格认定考试的制度化，为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培养了一批批人才，并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文官制度、社会组织管理的科层制和合理化的形成。这一过程在西欧和日本到19世纪末已大体实现。日本更成为世界著名的重视学历的社会。而中国这个科举制的创始国，经过一千多年到封建后期，科举制反而陈腐僵化不堪。维新派从反对八股取士“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之害入手，把培养人才、改革教育制度提到变法的根本高度。梁启超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强调“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主张效法德、日确立新的学制：乡设小学，县立中学，省和中央办大学。文化教育这些由旧学转向新学的维新派的本行，拿手好戏，也是维新时期留下深远影响的实绩的领域，如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商务印书馆及其他许多新式教育文化设施的建立，真正开了一代教育和文化的新风，其思想启蒙的作用直接、间接地影响了几代人。**维新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化推进到思想、文化、教育层的真正标志。**

在当时译介的各种西学著作中，以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原著为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所起的作用尤为强烈而深远。严复在这本书中介绍了西方生物进化论的进化发展观，特别突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他结合当时中国所面临的被列强瓜分的严峻形势，大加阐发，用“优胜劣败”来激励人们起来“自强保种”、救亡图

存，“转祸为福”。在哲学上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形而上学观念，成为以后前进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的重要阶段。在对民族存亡的认识上，从直观的形势认识提高到了理论的高度，从而大大深化了人们的危机意识和发奋图强的民族责任感。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翻译介绍西学的大师，他最早对中、西学作了扼要比较，他认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持人力。”（《论世变之亟》）。不过，在戊戌变法中，严复自己并没有直接参与多少实际政治活动，戊戌以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思想更步步转向保守。

三、义和团运动的二重作用

到1899年，帝国主义已经几乎把整个中国都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了：英国——长江流域、云南、西藏；俄国——东北、蒙古、长城以北；法国——两广、云南；德国——山东；日本——台湾（已割取）、福建。洋人的殖民经济文化向中国内地社区的渗入，越来越强烈地刺激起中国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广大农村居民的仇恨。就在得风气之先的爱国知识分子在京城及其他主要城市发起维新运动的同时，中国农民也以自己传统的思想、传统的组织方式和行动方式开始对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暴力斗争，这就是义和团爱国运动。

义和团于1898年兴起于山东，迅即蔓延到华北、东北，1900年达到高潮，波及长江下游和西北部分地区。它首尾一贯的宗旨是“灭洋”：灭洋教（教会、传教士及教民）、洋物。在对待清王朝的态度上，由于清王朝对义和团的态度前后期有根本转变，所以义和团对清政府的态度前后也不同。义和团前期的基本口号是“扶清灭洋”（或“保清灭洋”）、“除灭鬼子保大清”，与清朝统治者中当权的封建顽固派的仇洋心理有着相通之处，因而在前期，朝廷曾插手义和团，企图加以控制和利用。义和团旺盛的斗志给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以毁灭性打击，于是，奥、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国组成联军，以新式装备向义和团反扑过来，并胁迫清廷限期“剿除”义和团。朝廷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当权的慈禧太后派先是误信伪造的洋人照会——“勒令太后归政”（即将权力归还光绪皇帝）——而贸然向联军宣战，招抚、驱使团民为之效命。以后随着事态的发展，慈禧得知要她“归政”的传言不实，便在联军大举进攻面前转向，讨好洋人。北京陷落之后，她在逃跑的途中进而又下令“痛剿”义和团。义和团面对不断增派来华的联军十万大军和清官军的会剿，只得“官逼民反”，擎起“反清灭洋”的旗帜，继续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军的夹击中英勇作战，直到1902年才被完全镇压下去。

义和团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义和团所显示的中国民众的伟力，是连它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也看到了这“含有无限蓬勃生气”的人民，“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①正是在这种力量的威慑下，帝国主义宁愿维持一个形式上的民族政权做它们的傀儡和代理

^①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三册，第244页。

人。即用“以华制华”来替代瓜分领土的直接统治，使中国保持一个泛殖民地性的半独立状态。因此，自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再度猖狂发动侵华战争以前，除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各国在华势力范围的局部调整（如日俄战争和东北势力范围的一分为二）外，约30年间没有大的帝国主义军事入侵记录。阻止帝国主义的瓜分使中国避免沦为全殖民地，义和团功不可没。

不过，义和团运动虽然面对的是亘古未有的外来的新对手，但是其自身却是一个道地的传统型的农民暴动，并不具有现代意识。他们张贴的揭贴提出要“扒铁路，把电(线)砍，然后毁掉大轮船”，具有明显的逆现代性，他们的迷信思想和盲目排外的做法显然也太落后于时代，曾受到从维新人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鲁迅直到晚年，仍然坚持认为义和团是对维新变法的“反动”。^①

义和团运动显示出了农民的二重性：作为中国最庞大的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它蕴藏着最大的左右历史的潜力；作为落后的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载体，它又是传统的缺乏现代意识的阶级。因此，改革者也就不能不同时既重视这个阶级的潜在的力量，又要善于启发、教育、引导农民运动，把它纳入社会革新的前进道路，这是中国现代化最重要、最艰苦的社会主体动力发动工程。

在八国联军直捣京师的时候，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又搬出求和的老谱，签订更加屈辱的《辛丑条约》，中国中央政府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加上利息共9.82亿两，利息超过本数，再加上地方赔款2千万两，总计逾10亿两，史称“庚子赔款”。庚子前一年国家收入总共不过0.88亿两，^②这次赔款本息总计竟为当时中国政府年收入的11倍，人均2两多白银，中国的海关税和盐税等主要税收都被帝国主义指定专供偿还赔款之用。条约还规定允许外国在铁路沿线和使馆区驻军，而中国自己却要撤除京津间的炮台和天津周围的驻军。在宫廷斗争和对内镇压中善施淫威的慈禧太后，对洋人则完全服贴了，她下《罪己诏》，不是向国民谢罪，而是“念列邦之见谅”向洋人乞怜，并保证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③从此，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由于国际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为了协调它们的利益尤其是后来居上的美国的利益，在1900年7月八国联军入侵时，美国再一次提出“门户开放”，在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④的格局下，求得各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一种暂时的妥协。洋人正好乐得利用这个对内狠对外媚的卑怯的工具来进行殖民统治。这也是辛丑之后帝国主义暂停直接瓜分中国的又一原因。这一原因与民众潜力的威慑作用是相反而相成的。

四、清廷弥留之际的“二次维新”

经过戊戌变法与政变的反复、义和团的起义与八国联军的入侵、朝廷中后党与帝党及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反复较量，清王朝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下层被统治者不能也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了。同时，洋主子对这个老朽的朝廷亦有诸多不满，他们也要按照他们的殖民主义的利益和外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这个政府、改造中国。《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

① 《鲁迅全集》第6卷，第557页。

② 参见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教研室编《中国财政简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196页。

③ 《清德宗实录》第477卷，第15页。

④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52页。

强就要求清政府进行某些“改革”，实施“新政”。1854年即来中国、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达48年之久的英国侵华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此时便趁机向清政府献策，提交了《更新节略》，对清政府的外交、内政、武备、商务等诸方面拟出了具体的“更新”方案，为处在弥留之际的清王朝打了一剂强心针。为了迎合洋人的旨意和笼络人心，1901年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出逃西安时就颁发“上谕”，“预约变法”。自此之后，到1905年，清政府共颁发“新政”30余项，史称“新政时期”或“二次维新”。

“新政”的主要内容有：振兴商务，扩编新军，废科举，改革政府机构，1905年甚至还提出了预备立宪。

前期重点是在经济上，振兴工商，以广开财源，偿还外债，筹集军费，缓解国库空虚的拮据。措施为政府设立了商部（后改为农工商部），制定了一些工商法规，奖励实业及发明创造。尤其商会和商团组织的纷纷建立，使民族资产阶级有了自己的组织和准武装组织，体现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需要。民族资本主义势力抬头，内抗封建压迫，外抵帝国主义侵略，力争矿权、路权等权力的收回，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经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工商业的发展和相应的经济思想发展积累的成果。甲午以后，包括“新政”时期，中国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既有的基础上加快了发展步伐。^①不过，这种现代经济成分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巩固清王朝统治基础的作用，相反，由于清王朝政治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更加尖锐，反而成了颠覆清王朝统治的物质基础。

军事方面，为大清王朝奠定基业的八旗兵，到19世纪中期已腐朽不堪，不再适应对外对内的战争。由于“时事多艰，兵实为急务”，清政府把扩编新军以维持统治放在头等位置上。清代新军编练起于1894年，“新政”时期得到大量扩充。新军采用洋枪、洋操，仿照洋军的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各种兵种建制，聘用洋教习，开设武备学堂，培训各级军官，并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军事，还对新军士兵的年龄、体格、识字程度作了规定。1905年，清政府统一了全国新军的番号，计划全国编练新军36镇，由于经济的拮据，新军的编练未能按期完成。本来，清政府扩充新军是想为自己的政权建立一个新的支撑点，但是这些新兵、新军官受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宣传和策动，反而成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武装力量。同时，在建立和扩充新军时，由于朝廷无能，得靠像袁世凯这样一些有手腕的人物去招募、培植，这样建立起来的新军又往往为军阀宗派势力所把持，成为以后军阀乱华的祸胎，如以后大名鼎鼎的军阀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就是这样酿成的。

教育方面的“新政”是“废科举，办学校，派游学”。“新政”的教育方针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其保守的政治原则是一致的，但是它毕竟废除了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广设各级学堂，教学内容遍采西学，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又派了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留学高潮，单是留日学生在1906年即达1.3—2万人。^②即使国内的学堂，“首以经学根柢为重”，小学中学均限定读经、讲经、温经，到中学毕业，“共需读过十年，亦通大义”，而大学则有更高要求，“凡旧学所有者皆包括无

^① 1894—1911/1914年中国产业资本本年增长率15%左右，其中外国在华资本本年增长率为15.83%，中国本国资本本年增长率为14.44%（其中民间资本本年增长率为15.08%）——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7页。

^② 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6页。

遗，且较为详尽”。^①但是，时尚已是厌旧图新，新学一开，学生便趋之若鹜。更不用说摆脱了羁绊的留学生，一到资本主义国家便如饥似渴地扑向新鲜的学问，哪还管你什么“体”呀“用”的。所以，当初清政府停科举、兴学校的目的是指望能“广学育才”，作为“内定国势，外服强邻，转危为安”的基础，结果却事与愿违，这些人正好成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的先锋。中国人近现代留学史，简直就是一部近现代中国的革命史。

如上所述，由清朝廷主持的所谓“新政”，其出发点本来是保守的，“新政”肇始就说得分明：“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量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②意即封建宗法专制制度万不可变，只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和表面上“刷新”一下。这个宗旨在政治上阉割了维新派的“兴民权”的主张，发展观上也从进化论退回到体用分离的形而上学观念。所以，这种“维新”正如鲁迅所说：“单是皮毛”。换言之，“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③从现代化的发展观看，便是在维新变法时期向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层冲刺了一下之后，“新政”又退回到器物层了。但是，时势比人强。“新政”以为可以保“体”之“用”的工商业、新军、新学稍有发展之后，便不肯为旧体所“用”了，它要反作用于“体”了。无论是振兴工商所造成的产业新军，还是整顿武备编练的打仗的新军，或是改革教育造就的文化新军，都没有成为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统治的根本，反而都做了清王朝的挖墓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政”的客观效果，要远远超出其主持者的愿望，甚至正与主持者的愿望相反。

这样相反相成的效果证明，时代已前进到中国非变不可的时候了，愿变者变，不愿变者也得勉强变。勉强变，就是小变。不变则亡，小变则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时，清朝廷无论是禁也好，压也好，放也好，收也好，惶惑也好，徘徊也好，社会的变革都不以统治当局的意志为转移而在开辟自己前进的路了。

五、辛亥革命：中国早期现代化向政治制度层推进的高峰

传统的中国一方面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各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在进入近代之后，由于新的经济文化的输入，形成了传统社会经济文化与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叠加的二元结构，这种不平衡性和差距就更悬殊了。犹如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的巨龙一样，它的龙头——民族的最先进分子的思想可能已进入世界的最前列，而它的尾巴却还未脱出原始状态。

在洋务运动作为时代的新风被顽固派嗤之以鼻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就已开始立志于民主革命了。1835年的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暴露出清王朝不可思议的腐败怯懦。这一方面使列强更加胆大妄为地瓜分中国，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中国改革的先驱者的觉悟。孙中山正是“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造民国之志”。^④孙中山青少年时代在檀香山、香港和广州受过系统的西学教育，学了不少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① 《光绪政要》第二十七册，卷三十一，第57—58页。

② 《光绪政要》卷二十六，第28页。

③ 《鲁迅全集》第1卷，第336页。

④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

学知识。时局的变化,清廷的腐败,“改良祖国”的爱国热忱和西学的影响,使他逐步形成了民主主义的思想。关于具体如何实现社会变革的问题,在甲午战争前尚处于反复酝酿之中。1892年当他毕业走向社会之际,受到他的老师何启、同乡郑观应的改良主义影响,还对清政府的“维新”寄予一线希望。1893年冬,孙中山在广州曾与友人讨论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兴中会”。但是不久,又回乡写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的建议,其中心就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而李鸿章却根本不予理睬。孙中山在天津吃了李鸿章的闭门羹之后,又上北京,正值甲午战争,中国在朝鲜牙山战役中遭惨败,消息传来,举国震痛,而朝廷仍在赶修颐和园,准备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孙中山由此而断定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之路确实走不通了,遂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道路,在檀香山建立了“兴中会”,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入会誓词明确写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①当时,改良派正在京畿道上为向朝廷推荐日本式的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奔走呼号,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则已经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和美国式的发展模式。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就加紧发展组织,策划武装起义。1895年10月,广州首次起义失败,但是孙中山和“兴中会”的革命活动却因此引起了海内外的注意。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政府诱禁,经老师相救脱身。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许多政治活动家流亡到了日本,孙中山便去日本动员流亡在日的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反清,未成。但是其他许多原来追随改良派的维新志士,却因戊戌政变的倒行逆施而对清廷“断念”转向了革命。孙中山与唐才常的“自立会”取得了联系,1899年与唐才常达成了“殊途同归约”,准备起义。1900年8月,唐才常利用北方义和团运动勃兴之机,联络会党,策划“自立军”在长江流域起义,事泄而败。同年10月,“兴中会”发动惠州起义,曾发展到两万多人,仍败。但是孙中山革命之志既立,便“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②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方面是章太炎等政治活动家纷纷由改良进向革命并流亡日本,另一方面是“新政”开始以后大批留学生去日本,这些热血青年与革命家的结合,在日本东京形成了一个反清、革命的海外活动的中心。1902年春,孙中山与章太炎就中国的革命和革命成功后的政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903年,几部最有影响的革命宣言书和大众宣传著作问世,这就是被称为中国的“人权宣言”的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他们把改良派的进化的天演公理,推进为革命的“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明确提出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政治目标,把改良派在改良的名义下提出的东西统统以革命的名义更旗帜鲜明地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民主革命思想不断高涨。1903年的“拒俄运动”和留日“学生军”的斗争,挫败了沙俄胁迫清政府接受其侵占东北的“俄约”的阴谋。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同时,各地的革命团体也纷纷建立,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在长江中游建立的“华兴会”和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在长江下游组织的“光复会”。

1905年孙中山再到东京,受到各革命团体和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各革命团体经商议组成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

②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

了统一的新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通过了同盟会章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中，把这一宗旨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后来所称的旧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继承了中国华夏民族“夷夏之辨”的传统意识，汲取了西方民族独立、自由的思想，当时的具体历史内容就是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排满兴汉”、“振兴中华”，尚缺乏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其民权主义，主要采自西方的“平等”和“民治”的思想，也融进了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精神，主张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国。其民生主义，基本上采取的是美国亨利·乔治的土地单一税理论，也汲取了中国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资料，想用“平均地权”的办法，改革社会经济制度，防止再发生社会革命。孙中山自认为他的这一纲领是“社会主义”的，想“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这个纲领虽然有其缺陷和主观空想的弱点，但总的看，是一个要求建立共和制度的完整的民主主义纲领。三民主义的理论就是孙中山的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理论，它的提出使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目标更为明确，有力地促进了革命的发展。同盟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

同盟会成立后，各地分散的组织和活动得到了比较统一的领导，斗争的规模和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理论上，革命派在与改良派进行的革命还是改良的大论战中，驳倒了改良派君主立宪的保皇论，进一步论证了革命的必要性。同时，清朝廷亦打出了预备实行“君主立宪”的幌子，以应付舆论，消弭革命。在立宪派的策划下，慈禧太后一会儿佯装决定“预备立宪”，一会儿又来个“仿行宪政”，要尽花招，却仍是枉闻虚声，不见实行。直到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仍不见立宪踪影。同年，3岁小儿溥仪即位，其生父载沣任摄政王，才又不得不重申“预备立宪”，而预备期竟长达9年，连立宪派也等不得了，只好一再上书请愿，但却屡遭拒绝。到1910年才由朝廷炮制出了一个由“钦选”和“民选”议员组成的“资政院”。1911年5月又推出了一个由朝廷组成的“皇族内阁”，使立宪派也大失所望。所谓“君主立宪”的骗局，已由朝廷自己把它暴露无遗了，剩下的当然也就只有革命一条路。清王朝也就失去了最后的苟延的机会。

同盟会在与改良派进行的革命与改良的论战中，揭露了朝廷一延再延的假立宪的丑剧，与此同时，前赴后继地不断发动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自同盟会成立到辛亥革命，短短几年间就爆发起义10余次。

清王朝为扑灭革命烈火，疲于奔命，顾西失东。1911年正当朝廷调驻湖北等省的军队汇剿四川同志军起义时，起义烽火又从中国中部燃起，这就是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的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是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长期组织发动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也利用了清朝廷摇摇欲坠、四面楚歌的客观形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全国各地纷纷响应，50天内就有15省宣布起义或独立。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在南京宣誓就职，组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立即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在政治方面，要求实现全国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消除民族压迫和分裂，革除封建官场恶习；经济方面，振兴实业，设立实业部，各省成立实业公司，确定经济政策和统筹运行方法；社会方面，规定“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革除“老爷”、“大人”之类的称呼，实行男女平权，劝禁女子缠足、男人留发辫，禁止种植罂粟和吸食鸦片；教育方面，各级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小学废除读经，

把清朝学部提出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方针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孙中山还亲自主持，为南京参议院起草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全国人民一律平等，都有人身、财产、营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居住、迁徙、信仰等自由，有选举和被选举等民主权利，确立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具有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法的性质。

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民主派所颁布的政治、经济、社会、文教等方面的革新政策和法令，的确体现了社会现代化全面发展的需要。在民国成立初期，也的确出现过一派新气象，可以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将资本主义现代化中的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推向了高峰**，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中国执政并推行社会现代化的尝试。

如果这个局面能长久持续发展下去，中国的民主和现代化的实现就会顺利得多。然而，由于当时新生的现代性因素还很稚弱单薄，而积久的传统的反现代性势力仍然厚重，所以民国成立后不久，旧势力就回复过来了。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势力，是以海外为基地，以留学生为骨干，通过策反新军、组织会党而展开推翻清王朝的起义，进而临时取得政权的。它在国内还缺乏坚实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基础和军事力量，因而即使一时得到了政权，也不易巩固，很快得而复失。孙中山仅仅做了一个季度的临时大总统，就把这个位子让给了以封建旧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为后盾的有武力的军人袁世凯。

袁世凯等军阀上台之后，便大开复辟的倒车，革命民主势力遂与封建专制复辟势力围绕着独裁与民主、帝制与共和、复辟与反复辟展开了反复的斗争。

首先，袁世凯一上台，使倚仗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力图消灭民主势力，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甚至复辟帝制。孙中山则重新组织和领导革命力量发起“二次革命”来推翻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维护民主共和制。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又靠出卖国家领土和主权换来了俄、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爬上了正式大总统的宝座。1914年，袁世凯正式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成为大权独揽、能“合法”终身连任和世袭的独裁者，“民国”已成虚名。另一方面是“公民讨贼军”起义反袁失败。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袁世凯希望得到日本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要点为：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特权，并加以扩大；2.日本取得东北南部和蒙古东部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租借期限都延长到99年；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4.中国沿海的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让予他国；5.聘日人为中国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承认日本在武昌、九江、南昌、杭州、潮州间的铁路建造权，允许日本在福建省有筹办铁路矿山、建筑海港船厂的优先权。除第5项留待以后继续协商外，袁世凯派人接受了日本的其它各项要求。袁在得到帝国主义支持后，更忘乎所以，正式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并定于元旦“登极”。反袁势力则组成“护国军”，在云南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在举国怒讨声中死去。

袁世凯死后，又出现了皖、直、奉、晋、滇、桂等各派军阀割据，合纵连横、互相争斗的混乱局面。在混乱中，清廷遗帅张勋率“辫子军”入京于1917年拥废帝溥仪“登极”复辟，

仅12天就被赶下台。以后，仍是北洋军阀执政，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孙中山又联合南方护法军掀起护法运动，但是护法军的首领同样是抱有皇帝思想的军阀，孙中山由此痛感“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这些斗争的国际背景为，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寻找在华的代理人不断加深对中国侵略使中国殖民地化；国内背景是，随着现代产业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分化，旧的社会整合机制逐步崩溃，而新的整合机制、民主法理权威又难以确立和普遍化，真正有现代理性精神的社会成员还不多，以现代产业发展为载体的新兴阶级、阶层尚在幼稚的发展阶段，社会大多数人仍依附于旧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旧的社会阶层，从而形成新旧各阶级、阶层和各种利益集团的激烈冲突和反复较量。

六、孙中山的中国现代化蓝图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本来想立即着手实现其使中国现代化的宿愿，但是，军阀们的倒行逆施使他不得不先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军阀势力的斗争上。在与西南军阀决裂、革命受挫后，他在上海仍抓紧短暂的革命的间歇期，于1917—1919年撰写他的《建国方略》，这是孙中山留给后人的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这个方略他毕生都没有写完。当时已完成的有三部分。

方略之一为“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这其实就是孙中山的发展哲学。从他的其他论证中可以看出，他力辟传统的“知易行难”说之非，突出体现了他的发展哲学的反传统精神。“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在中国古籍中始见于伪古文《尚书·说命中》傅说同武丁（殷高宗）的对话。以后，《左传》等古典中都有类似的话相传下来。意思是说，“知”并不难，难就难在“行”。孙中山反驳说：中国数千年的思想见识，已习为自然，许多所谓知识并未经过科学考察，不知其谬误，就算作是知识。这种“知”，自然容易。若按科学考察，就会发现其大谬不然。而“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那就不容易了。因此，孙中山特别强调了“先知先觉”、创造发明、认识新知的艰难和“后知后觉”、“仿效推行”之易。他大力揭橥“知难行易”的主张，体现了他的理性的科学精神和对因循迷信的陈腐态度的抨击，其中也蕴涵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几代人为图中国之富强付出无数牺牲和巨大代价、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体验。同时，也体现了他对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无论是物质建设还是精神建设）的艰难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思想准备。他认为，只要国人懂得了“行易知难”的学说，破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心理大敌”，“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言、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①因此，“当革命破坏告成之际，建设发端之始，予乃不禁兴高采烈，欲以予生平之抱负与积年研究之所得，定为建国计划，举而行之，以冀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焉。”^②作为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哲学，它还具有明显的赶超型和模仿型的特征。孙中山一再强调：“倘使我国之后知后觉者，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迷信，而奋起以仿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建设一世界最文明进步之中华民国，诚有如反掌

^{①②}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118页。

之易也”。^①他每每以美、日为例进行比较，分析中国种种有利的人文、地理等条件，便预言：“美国需百余年而达于强盛之地位者，日本不过五十年，直三分之一时间耳。准此以推，中国欲达于富强之地位，不过十年已足矣”。^②其爱国之情可感，其急于求成之愿可鉴。

建国方略之二为“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这是孙中山的“方略”的核心，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这个“实业计划”是孙中山1918年为“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而提出的计划书，他把中国实业的发展放在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复兴的背景中考虑，希望借势求得共同发展。同时，他又强调，“**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③这是孙中山对中华民族在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由六种计划组成，以水陆交通建设为先导，作了宏大而又具体的规划，同时对农业和食品工业、纺织服装业、建筑与建材工业、交通工具运输设备工业、印刷工业、燃料工业、钢铁与有色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等农、轻、重各业的发展均有所论述。他生前未能见到这一计划的实现，但是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发展思想和一幅很有参考价值的蓝图。其中，许多计划现在经过修订已逐步实现；有些计划，如10万英里（约合16万公里）的铁路网，则至今还只实现了一个尾数（中国大陆与台湾的铁路通车里程总和现约6万公里）；有的则正在创造实现的条件，如世界第一水力发电站三峡工程自以此以来，经70余年设想，50余年调查，40余年勘测，30余年争论，今终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立项，本世纪末将正式上马。总之，要实现孙中山的遗愿，仍任重而道远。

建国方略之三为“民权初步（社会建设）”，这已不是同盟会时期纲领性的民权主义和《临时约法》中对公民集会、结社等民主权利的原则规定，而是力图使之具体化、操作化。对各种集会、结社的组织方法、规则、程序、主席、委员等的产生和职责、会员的权利与义务都作了具体规定，尤其对议会动议、提案的提出和审议作了非常细致的说明。作者力图通过这一整套现代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的完善取代传统的专制统治。因此，他强调：这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应该“成为一普通之常识。家族也、社会也、学校也、农团也、工党也、商会也、公司也、国会也、省会也、县会也、国务会议也、军事会议也，皆当以此为法则”。^④这是孙中山为使中国社会组织生活特别是政治运行机制民主化、现代化所作的苦心设计和具体教材，是一种启蒙性、普及性、操作性的组织社会学和政治组织学的读物，对中国社会组织生活的转型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他以为有了这么一套计划，大家都懂得了，便会照办，新的社会秩序便计日可成，“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则未免太简单乐观。

按他的著作计划，《建国方略》之四《国家建设》将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五权宪法》、《地方政府》、《外交政策》、《国防计划》八册，后来只完成了一部分。

综观孙中山当时和后来已完成的以及设想而未完成的建国方略看，实为一个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科学、文化、外交、国防在内的完整的社会现代化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设计中的有些具体内容现在已经和正在成为现实，但是在当时，许多仅是主观的愿望，还有一些则

^{①②}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③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

^④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5页。

属于误会、轻信和浅见。例如，他当时虽然已经历了不少挫折，仍然对国内旧势力的根底的深厚、改革之艰难缺乏足够的认识 and 思想准备，对国际帝国主义也指望过多、过大。孙中山当时已看到了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因而力图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引起的经济上的贫富分化、社会结构上的阶级分化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不过，他对国际上多达数十种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又还未来得及弄清究竟，就把自己的这一套方案归于社会主义的范畴，并“欲使外国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其实，他的方案无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恰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方案。

到此，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基本方面的因素，可以说都初次出台了。但是：第一，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第二，现代性因素稚弱，很不巩固；第三，无论是现代性的诸因素之间，还是在社会各阶级、阶层中以及城乡各地区中的推进，都很不平衡。以后还经历了多次巨大的反复和挫折，现代化的发展条件才基本到位，有关情况将另文论述。

主要参考文献：

1.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
2. 《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 《杰士书汇录》卷二（内府抄本），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
4. 《饮冰室合集》，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版。
5. 《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6.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 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责任编辑：唐 军

天津市社会学学会召开1991年学术年会

为了迎接1992年全国社会学学术年会的召开和推动天津市社会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天津社会学学会于1992年元月11日召开了1991年学术年会。理事长王辉同志主持了会议，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苏驼同志作了工作报告。与会同志围绕“当前中国社会变迁与小康社会研究”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天津社会学学会）